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 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姚璐 景璟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共生型全球治理;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1.02.008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1)02-0113-(14)

[收稿日期] 2020-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CZZ0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6JZD027);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101832020CX038)

[作者简介] 姚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景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已经蔓延成为威胁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并且由疫情所引发的经济衰退、社会危机、政治动荡等一系列衍生危机的风险也正在加剧。面对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诸多未知,全球进入了真正意义的“不确定时代”。自2016年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逆全球化的声音早已甚嚣尘上,疫情情境下的“隔离”更令本已举步维艰的全球化雪上加霜。在全球进入高风险的背景下,抗击疫情本应是各国精诚团结合作,但现实的图景却

NORTHEAST ASIA FORUM

是西方国家对他人“污名化”“妖魔化”盛行,以及对全球卫生治理多边机制的质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然而,应对全球性问题最有效的路径依然是全球治理。当前全球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是由一直以来全球化迅猛发展与全球治理效能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所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让人类重新反思自身的自然属性。自然界的基本运行方式基于“共生”,同理,只有国家间实现“共生”,才能有效应对疫情,以及由疫情所引发的诸多全球性问题。

一、疫情加速全球治理向“共生”转型

无论是关系治理还是规则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转型的理念和视角,其本质都是以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兼容并蓄的包容思想为依据,试图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寻求共通性和联系性,将全球治理的主体间关系视为一种共生关系,从主体的异质性特点出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这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存在本质的差异和不同。

(一)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与转型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就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但改革与转型的步伐始终困难重重。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外化形式之间存在不对等性。早期西方国家推广的全球化实际上最终表达的并不是各个主体在共同利益下的自动趋同,而是走向更加深刻的分裂过程。^[1]这必将导致全球范围内混乱无序状态的出现;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由此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和福祉的同时,也在经受着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侵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日渐加深,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逐日增加,治理规则体制的不完善、国家利益与价值的不认同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对既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也有必要进行转型,而转型的原点则要回到全球治理理念本身,从初始逻辑出发构建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

早期西方国家推广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上代表了其自身的扩张性、对立性、冲突性和不平等性。全球化观念影响下的全球治理模式,也将呈现出相应的特征。

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是“中心—外围”的环状结构。无论是政治关系的“权力理论”“结构理论”,以及经济关系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展现了以西方大国为中心的主要逻辑,发达国家处于全球治理的中心地位,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治理结构的边缘;其逻辑并没有脱离“零和博弈”思维和丛林法则的旧规制,全球治理表现出弱肉强食的体系特征。国家被视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为体,“过度关注对自身利益(尤其是相对收益)的追逐以无限制满足超越自身界限的欲望”,^[3]传统的全球治理规则实际上就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其实现路径是通过

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建立在西方一元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思想,表现为“冲突型”的治理观。^[4]无论是力量、结构还是过程的关系建构都是以消灭对方为前提;其主体的选择具有同质性和排他性,更多的是西方国家之间的“俱乐部”,这种非中性的特征,使全球化更可能是局部一体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全球大小国家平等谈判的结果;更加关注国家间权力的分布,忽视了全球治理主体间应有的平等性。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权力等级制度才塑造了全球治理的结构、根本目的和优先权。^[5]

正是由于这些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固有的顽疾,反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这场本应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危机,却撕裂了整个国际社会。如何坚持和完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西方国家崇尚规则式、法则式的因果逻辑,必然会对全球治理作出从属性、等级性和冲突性的判断,而中国的思维逻辑更加倾向从关系出发,主张建构一种关联式的秩序判断。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崛起和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转变,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勇于做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

(二)疫情冲击下“共生型”全球治理的形成

疫情的全球扩散,已经使全人类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隔离”之下严重受阻。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加之疫情之前便已盛行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持续攀升,各国国内的政治社会风险加剧,随之而来的全球政治进入了高度动荡期。如何在“不确定时代”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在被疫情撕裂的国际社会寻求共识,在高度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系和平……这些问题的回应,需要突破传统全球治理的桎梏,以“共生”来重塑全球治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共生的反思,而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更需要超越私利的国与国之间的共生。当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经济社会在“疫情常态化”下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2020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转负为正”,实现了3.2%的增速。^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预计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只有中国。”^[6]在全球抗疫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勇于担当,持续扩大开放,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坚决拥护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领导。积极倡导“顺应全球化大趋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努力实现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7]

当今对于全球秩序的判断应该是全方位的,尤其要从生物圈的整体依存性出发,将其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8]“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基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共生判断而提出的。“共生”不仅是生物界存在的常态现象,同时也是国家生存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7/t20200717_1776516.html。登陆时间:2020-09-26。在疫情影响下,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8%。

果。^①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功能和权力的流散,改变了国家对外行为方式,使国际合作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的行为规则和主流价值体系当中,为国家间共生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②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则使国家的共生关系不断向国内社会进行延伸,最终产生了国内与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网络体系结构的构建,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了复合型的联动和互通。可以说,当前各国均处于全球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之中,因此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的转型,也应该建立在全球共生主体间互动的基础上展开。

那么,“共生型”的全球治理是否与传统西方的全球治理相对立或冲突呢?答案是否定的。正是由于“共生型”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主体间的异质性和包容性,因此,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虽然与原有的西方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却并不是对原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推倒重建和全盘否定,也不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鼓吹和输出,而是强调“异质共生”“兼容并蓄”,力图消除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和难题,是对既有的全球治理理念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全球化发展回归到公平正义的原有轨道之上,使全球治理表现出更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存在融通性,与最初的全球治理内涵和初衷存在连贯性,具体表现在共生关系的动态性发展之中。

“共生”不仅是对于全球化时代下国际社会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对未来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前景表达和实现国际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进化的理念是共生的本质特征,强调共生系统内的共生单元之间、共生单元与共生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作用,这种作用可加速共生单元及共生系统的进化创新,并产生新的物质结构。”^[9]从全球共生关系网络建立以来,其内部结构和共生关系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共生关系中,根据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可以将其划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以及互惠共生三种形态;根据共生的组织方式或阶段可以将其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10]根据共生关系的

① 所谓“共生”,最先起源于生物学的研究当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物通过相互依存在生理上所达成的一种平衡关系。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De Bary)曾指出,“共生就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共生模式所形成的关系”。De Bary, (Heinrich) Anton, and Charles C. Gillispi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0, pp.611-612; 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曾围绕共生创立内共生学说,认为物种的发展并不只是优胜劣汰的新达尔文主义和基因随机突变的传统进化机制,而是彼此间的利益合作所导致的“共生发源”现象,即通过新细胞、新组织之间共生所产生的合并作用形成新的器官和物种。因此,其强调共生才是事物发展的、尤其是新事物发展的直接起源。尹传红. 内共生学说:挑战正统观念——马古利斯与《生物共生的行星》[J]. 绿叶, 2014(5); 共生概念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大要素。随着其不断发展,“共生”的概念逐渐被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应该将“共生方法”运用到社会生产体系的研究当中;中国学者袁纯清提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高度的可塑性;2006年,胡守钧提出了以倡导和谐为核心的“社会共生论”,强调了社会共生关系中人的重要意义。2012年他又在“社会共生论”的基础上,指出要以社会的共生关系为基础对国际社会进行研究,由此提出了“国际共生论”的理念;2017年,夏立平以共生理论和系统理论融合的视角,提出了“全球共生系统理论”,认为全球的一切事物均处在相互联系、依存、作用并转化的共生系统当中。袁纯清,谢锐.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6;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1;胡守钧. 国际共生论[J]. 国际观察,2012(4):10;夏立平.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 美国研究,2017,31(1):21-45,5.

② 所谓国家间共生,就是指国与国之间在一定的内外环境中依靠某种机制的作用所形成的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现象。梁颖,黄立群. 共生型国际秩序与命运共同体建设[J]. 南洋问题研究,2017(1):39-50.

发展水平亦可分为相互联系、相互共存和相互依存三个阶段等等。

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判断,实际上处于共生关系的初级阶段,全球治理模式是单一的、被动的议题型治理,是一种在“共栖”基础上本能的合作,其归宿是基本的生存需求。从共生模式上来说表现为点共生、间歇共生或偏利共生,从共生关系的发展阶段来说表现为第一阶段的相互联系;而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多的回应了现实的变化,体现了全球化迅猛发展所产生的新型共生关系,即现代意义的共生——“肯定不同群体自由和交往能力基础上建立起的积极社会联系”,表现出主动性、和谐性以及多元性特征。^[11]同时,“离域思维”的出现使国家将自身的利益和关切嵌入到域外国家和地区之中,国家需要在相互代理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双方的互利共生^①。(见表1)

表1 共生理论与全球治理转型的融通性说明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		
	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	共生型全球治理体系
主体选择	同质性 排他性	异质性 包容性
主体定位	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为体	理性的关系主体
利益关切	相对收益的最大化	关系中的绝对收益
影响因素	权力分布	权责平衡
结构形式	中心—外围的环状结构	互动的网状结构
结构特性	等级性 从属性	平等性 关系性
思维逻辑	零和博弈(冲突)	合作共赢(合作)
实现路径	资本主义扩张	平等谈判
共生关系的优化升级		
	消极共生	积极共生
主体选择	特定主体	多元主体
行为方式	寄生 偏利共生	互惠共生
共生形态	点共生 间歇共生	连续共生 一体化共生
共生阶段	相互联系 相互共存	相互依存
合作方式	被动本能的合作	主动构建的合作
合作目的	生存需求	发展需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因此,“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下的全球治理转型,是从消极共生走向积极共生的优化和从共生的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升级,体现了构建“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的愿望和诉求。这一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的问题,着力点就是如何实现均衡、平等以及和谐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中就是提出构建人类命

^① 苏长和在其文章中运用“是否拥有对时空的借用”来定义定域和离域思维,认为随着国家与外部世界互动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将与他国在分离的时空内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5-25,156.

运共同体的目标,这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效能低下,且危机频发、资本逻辑抵达自身历史极限,以及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提出的人类生存与发展新方案,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12]

二、共享理念优化“共生型”全球治理

共生关系是对于当前全球秩序的客观描述,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主体均处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这成为以共生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假设。^{[13](3)}同时,全球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共生关系也必将在动态中实现改善、优化和升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已经建立了连续共生的模式,未来如何使这种连续且互惠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遍化,并积极构建和谐的一体化共生模式是对“共生理论”提出的更高要求。然而,“共生”只是对当前全球秩序状态和未来转型目标的客观描述,仅仅从理论上依赖状态自身去实现优化和升级需要极其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与现实中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迫切需求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特征。因此,需要借助一定的理念工具去推动实现优化和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发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转型具体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共商”就是在处理全球事务的过程中,“大家的事情大家说了算”,打破少数国家对于全球治理规则的垄断,使全球治理的规则更加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关切;“共建”就是要依靠各个主权国家,尤其是要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构建平等共建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共享”则是强调了全球发展或全球治理的成果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在各个全球治理的主体间实现平等的共享。“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仅解决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谁治理的问题,同时它实际上体现了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价值的一个不断升华和递进的过程。如果说“共商”和“共建”为全球治理转型和建设过程中提供了具体的规则和实现路径,那么“共享”则是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更长远的规划,其理念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共商”和“共建”的具体要求,既是全球治理价值的归属和落脚点,同时又是对共商共建内生动力的进一步深化。

因此,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构建高层次高阶段的全球共生关系,需要发挥共享理念的作用,在共生背景下实现共享,在共享的补充中优化共生。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全球治理转型的高级目标与共生关系自身局限间的差异性所作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共生关系中最高级别的体现,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4](540)}以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价值共识为基本框架。发挥共享理念的积极作用,能够对共生状态自身的局限性进行补充,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大支柱的构建。

(一)以资源配置的优化构建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物质前提,将利益作为连接各行为主体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桥梁,在全球范围内“编织更加紧密的利益网”,通过利益的融合来提升合作的动

力和层次。各类行为体在寻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都以“利益”为支撑,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由此国际社会的共生网络系统又可以被视为利益共生网络系统。^[15]从国际行为的本源来看,其行为的不同来源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利益的争夺更像是一门关于稀缺性、竞争性和权力的经济学;^[16]而从利益的本源来看,它是资源转化的形式和成果,各类行为主体对利益的争夺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特点之上的。因此,国家间冲突的本质大多是基于对各类自然或社会资源的争夺而形成的。资源构成了共生关系存在的纽带,同时也是对其进行约束的工具。^①

然而,共生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够在发展中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发挥共享理念对共生关系的优化作用,改善现有共生结构下资源的流动和交换方式,提升共生结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由于国家间能力和地位的差异,各国在资源分配以及发展机遇等方面面临着不平等不公正的现状,资本扩展带来的不平衡造成了国家间发展鸿沟的日益加深,发展中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充当其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秩序和规则以实现对它的约束和控制”。^{[17](47)}久而久之,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日趋显著,被发达国家“加以抽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自身实力的提升并对这种现状进行改变,最终将形成两极化发展的恶性循环。而共享理念主张从资源配置以及发展模式两个角度进行优化,要求各国共同应对发展和治理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球治理问题中公平正义的问题;同时,共享理念强调机会平等,而不是资源所有方式的平等。这与西方的“理性”和“权力”假设形成了鲜明对照,以“随时使用,何必拥有”的资源共享观念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的“消费即占有,占有即存在”的固化所有权理念,^{[18](16)}从根本上改变了“零和博弈”的思维,为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关系的共生提供了可能。

(二)以主体认同的强化构建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责任共同体为前提承诺,通过责任的共担对于全球行为主体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约束,确保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性和秩序性。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曾经指出,当前全球政治进程的失败或不充分很大一部分是由国际竞争中形成的决策圈与具体公共产品外溢范围的不匹配所造成的。^[19]因此,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进行转型,必须在处理全球问题、威胁或挑战时,由各国共同参与并共担责任与风险,实现权责关系的平衡。

当然,这种权责分配是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的,各主体间责任的分担是以主体参与程度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而权责关系的持久性前提就是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共识。^②但是共生只是在单位个体层面构建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和相互支撑的纽带,并不意

① 所谓的“约束”,就是对不同的共生关系构造不同的底线,从而维护共生关系的和谐。在国际社会共生论的相关论述中,资源包含三类,即物质性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以及制度性资源。其中,物质性资源是基础性资源,对共生关系发挥原生的约束作用;公共文化性资源是智慧结晶,构成了各个行为主体的决策资源;而制度性资源(又称制度文化),能够以制度的形式对共生关系的拘束性进行强化。

② 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中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这一原则首先强调责任的共担,要求各国共同承担义务来应对和解决危机;同时也强调有区别的承担责任,这一点正是基于各国发展水平、历史责任等差异所提出的。

意味着群体认同的必然形成。实际上,群体认同与社会获得感紧密相连,而这种获得感并不是来源于国家利益的平等化达成,而在于发展机遇的平等性获得。“共生型国际秩序存在的源动力在于其能够产生共生能量,共生能量是共生型国际秩序给共生系统带来的净能量增加……即通过共生可形成一种良性的机制促进处于该系统内的国家共同发展”。^[20]为了确保当前较高阶段的共生型国际秩序能够得以维持,并存在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共生模式的可能,就必须寻找和提供其存在的动力来源。只有“本着共享的理念为所有成员提供社会基本物品,才能够消除社会成员对于偶然因素和社会外部环境的抱怨”,才能够从根源上强化共生动力,为全球共生治理带来新的能量增长点。^[11]

(三)以和谐包容的指引构建价值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共同的价值为保障,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具有高度的包容性。^[21]其中,和平与发展被置于共同发展的首位,国际行为主体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必须在共生性和群体性交汇连接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只有在与他者的共同合作和发展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利益和价值。^[22]但是共生理论只强调了不同个体之间不断被强化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了对各主体自身主体性的维持、发展和显现,却并没有否认体系内部可能出现的竞争和冲突的问题,“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只是强调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当前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在和平合作中竞争态势逐步加剧的世界,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复杂图景和“合争”的状态;^[23]同时也是一个面临着重要抉择的世界,“人类有可能退回到国际政治的无序混乱中,退回到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状态,也有可能迈向新型国际关系的有序共生发展道路上”。^[24]因此,如何从根源上解决现实中冲突与争端的问题,如何避免国家在共生关系中再次陷入丛林法则的无序争斗,是当下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也是引入共享发展理念的问题来源。

同时,共生理论在面对以异质性为基本面的全球现状时,只是提供了最低的要求——即不同群体之间的互不干涉,将“国际和其他行为主体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作为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的共生性底线”。^[15]无法从理论上解决现实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更无法为这类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普遍化的标杆和规范。

日本学者在对共生关系制约性条件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曾指出要承认个体间的独立性和异质性,“要树立新的结合关系的哲学”,而不是追求社会的同质化方向。^[25]共享理念正是以承认主体的多元性为理论基础,本质上延续了和解的思维,打破了西方同质性国家关系的固化思维,承认了行为主体的异质性特征,努力打造一种“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26]⁽²⁴⁾由此,共享理念从主体性的角度对共生关系的存在和优化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因此,必须依赖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构建和谐合作的价值观,消除异质性主体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竞争。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转型中的共享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全球化的“熔断”,但却不是当前全球化陷入困境的根源。西方新自

由主义裹挟下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段时期全球经济的繁荣,却也导致了国家间与国家社会内部不平等的加剧。2011年被称为“全球化的愤怒之年”“占领华尔街”振聋发聩的呼喊——“1%与99%”的矛盾至今十余年间非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一面“放大镜”,使这种“不平等”更加凸显,国家的对立,社会的撕裂,个人的迷茫集中爆发。不平等是当下全球化危机的根源,在国际社会缺乏中央权威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全球治理实现公平与正义才是重启全球化的核心。中国所提出的“共享”,恰恰是破解难题的良方。

中国是第一个从疫情中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7]在战胜国内疫情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同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危机。中国抗疫背后所表现出的治理优势与效能为全球共同抗疫提供了宝贵经验,抗疫过程中对全球共生的判断与全球共享的实践为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构建发挥了积极影响与贡献。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讲话时提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这便是中国在疫情的危难关头,依然坚守共享的真切体现。^[28]

共生关系是中国对当前全球秩序的现实判断,“共生型”全球治理则是中国对未来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理念表达。在这一实现道路上,“共享”理念作为实践的引领和桥梁,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实现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转变、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贡献。在共享的概念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为命运共同体从自治走向共治、独享走向共享、异质走向共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路径”^[29]。因此,“共享”早已不单单是一种观念、一种提法、一个呼吁,而是融入到了国际秩序的塑造中,容扩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中,蕴含着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共享理念,正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参与到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当中。

(一)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中的共享

美国学者劳伦斯·芬克尔斯坦(Lawrence S. Finkelstein)曾经指出,全球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国际社会不存在最高权威的条件下,各国政府内部行为的国际化表现。^[30]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呈现出双向的互动特征。一方面,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包含着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和实践的协调;^[31]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其合理的配置和良性的运转能够对全球治理产生助推和深化的作用,良好的国家治理更有益于实现全球善治的目标。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便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信息、共享数据,积极合作。也正是中国在抗疫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才取得了当前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32]

可以说,共享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的全新表达,是对于中国发展经验和规律的高度总结。“共享发展理念虽然注重于国内的公平、正义和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但其思想的穿透力和理论的影响力已彰显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33]一方面,共享以人民为主体,强调“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是解决国内社会发展问题与制约性条件的根本路径。共享理念的提出,最初聚焦于国内问题,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延续和归宿。另一方面,共享也是中国特色道路和经验的体现。随着其在实

践中内涵的不断延伸,共享理念开始蕴藏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中,是“一种愿景与期许,也是共生关系的落实和目标,目的就是不断充实和平共生的内涵和完善共生理念,并使之向和谐共生的高阶段发展”。^[34]“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既不是一种阶段性的考虑,也不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具体思路”,而是将“做蛋糕”与“分蛋糕”统一于中国对外发展的道路和阶段中。^[35]

因此,“共享”实际上是一个国内外层次互动的命题。共享的理念与实践,是中国良好的国家治理向全球治理层面的扩展与延伸。例如,国家治理中各民族平等的要求对应着全球治理中对国家间平等的呼吁;国家治理中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对应着全球治理中国家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促进;国家治理中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推动,对应着全球治理中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等等。从一定程度来说,“共享”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影响力正是来源于中国国内政治制度的生命力,是国内共享发展理念在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中的体现与表达。同时,共享的理念与实践,也是全球治理的目标与要求为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的宏观视野和权威指导。“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4](105)}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五大发展理念、三个坚持等,都是基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发展和外交经验而产生;中国对国家边境职能的扩展、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义、国内资源的整合流动以及国家技术的创新发展,都是基于全球视野下的发展判断与合作要求而出现。“共享”不只是理念上的呼吁和引领,更是中国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联结、互利共生的实践与表现。

(二)全球治理制度变革中的共享

在以无政府为基本特性的国际社会中,全球治理的本质实际上是全球治理制度,强调制度规则的作用。^①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曾经将全球治理定义为“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跨国影响的各级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中的大量规则系统”。^{[36](9)}构建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一直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一方面,其通过对全球治理中具体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权责分配、报偿机制以及舆论传播等方面的控制和垄断,巩固了不平等的全球治理秩序;另一方面,其利用自身在全球治理中优先的规则权和话语权,“实施金融与贸易霸权,转嫁经济危机”。^②在全球治理层面形成了两对矛盾,即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呼吁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垄断之间

^① 全球治理制度是指治理主体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制定并实施的关于治理的价值、主体、客体、方式、成效的规范要素(正式或非正式)的集合。Smouts, Maire-Claude. *The Proper Use of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155); Oran R. Young. *Governance in World Affairs*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具体的观点参考:巴殿君,王胜男.论中国全球化认识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J].*东北亚论坛*,2019,28(3):10-27,127;王明国.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J].*当代世界*,2017(2):60-63.

的矛盾,以及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统一的国际制度与多样的国内制度之间的矛盾。^①

当前,全球治理正在由单一的议题型治理模式向复合型转变,其模式已经不再是单纯寻求各国在共同问题中的利益集合,而是需要发挥制度的作用对其进行约束,推动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和延伸。^[37]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必须发挥制度在维护全球秩序、促进整体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和基石性的作用。^[38]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有意愿且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变革中,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是中国不断向世界大国走近的必然选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并深度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已经从“全球经济治理”转变为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其重点已经从单一的外交事务转变为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2013年,习近平提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39]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016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制度性话语权”,要求用制度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固化。^[40]

“‘共享’作为社会主义对以往政治制度的重大超越”^[11],被蕴含在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以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达成的“北京共识”“杭州共识”^②之中。蕴含着“共享”的制度变革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全球秩序的稳定提供了“软性”公共物品,共享的制度理念正在通过“中国话语”逐渐融入到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当中,使共享以制度的形式在全球治理中得以巩固。

(三)全球治理效能提升中的共享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从国家治理的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此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4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42]同理,从全球治理的层面而言,“国际上的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43],如何完善国际多边主义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问题和难题。随着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和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不断深入,相应的国际制度也面临着从全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30.在此次会议中,提出了对于“两类规则”(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统筹问题。

^② “北京共识”是2004年由英国学者提出,主要包含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三方面内容;“杭州共识”则是指2016年中国在杭州G20峰会上与其他成员就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达成的一系列方略和原则。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 London, 2004;于军,王发龙.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6(11):59-63.

全球治理的制度优势向全球治理实际效能的具体转变,需要在具体的路径中实现制度理念的落地。因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应有之义。”^[44]

一方面,共享理念自身的不断超越和完善对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有效助力,正在对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低级共生向高级共生的状态优化产生助推,共享的内涵正沿着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得以延伸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实践也是对共享理念的直接表达,使共享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制度理念向制度实践的具体化、操作化转变。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进行演讲时提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可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新范式,是在国家间彼此信任、相互尊重、追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对国际秩序的再认知,不啻为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的形势下,国际社会解决治理赤字的良药。”^[45]

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转型的具体实践和贯通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承载,既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又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46]除了“一带一路”倡议自身所推行的国家间合作交流项目之外,还在其框架下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一批新的机制,推动发展机遇、发展责任以及发展成果在各国间的共享。同时,“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尊重联合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以联合国现有的规则规范为基础,将“共享”内嵌到联合国现有正式的制度安排中,与现有的全球治理形成了相互契合、相互补充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项基于“双需驱动”的国际合作倡议和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享经济’模式”。^[47]共享的制度理念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转化为全球治理效能,从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四、结语

共生性作为全球化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和对现实最直接的表现,既决定了共生网络中全球问题传播的普遍性与快捷性,同时也代表了“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构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使全球发展机遇与全球秩序失衡所带来的治理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同时,也不禁让人们开始反思全球治理的现状与未来,疫情成为了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构建新型全球治理的催化剂。处于全球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中的全球治理转型,其本质是从消极共生走向积极共生的结构优化,这一过程既要遵循共生阶段自身的基础特性,防止打破共生状态的约束性条件;同时又要发挥共享理念的助推作用,解决共生阶段优化过程中的困境和难题,为早日实现高阶段的一体化互惠共生、加快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可以说,共生既是全球化时代对国家间关系的客观描述,同时又是疫情冲击下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要求与目标。在“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构建过程

中,共享成为了理念上的引航杆和现实中的助推器,只有将共享融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观念中,融入全球治理制度变革与完善的过程中,融入全球治理效能的提升中,才能够从根源上弥合全球治理可能存在的不足,使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在全球网络关系中更加良性、有效地运行。

参考文献

- [1] 胡大平.具体地历史地理解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的实践[J].哲学研究,2000(4):13-20.
- [2] 习近平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8/08/17/ARTIlgq1V8L4CaO2yBJqcVc3180817.shtml,登陆时间:2019-12-20.
- [3] 虞海波.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对世界发展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41(5):58-66.
- [4] 毕海东,钮维敢.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4):125-140.
- [5] [英]托尼·麦克格鲁,陈家刚.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33-42.
- [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R].June 2020.
- [7] 推动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N].人民日报,2020-08-12(003).
- [8] Martin Hewson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 [J].New York: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 [9] 袁年兴.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J].湖北社会科学,2009(2):100-102.
- [10] 姚璐.论国际关系中的“共生安全”[J].国际观察,2019(1):51-66.
- [11] 李建华.从共生到共享:人类的意义性攀越[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46(5):55-60.
- [12] 引领全球治理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N].福建日报,2019-01-18.
- [13]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0,105.
- [15]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J].社会科学,2011(10):12-21.
- [16] Hoffmann S.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Daedalus, 1995, 106(3):41-60.
- [17] 邢文增.新帝国主义:理论、现实与发展趋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7.
- [18] 张玉明.共享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6.
- [19] [英]戴维·赫尔德,杨娜.重构全球治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48(2):19-28,158.
- [20] 梁颖,黄立群.共生型国际秩序与命运共同体建设[J].南洋问题研究,2017(1):39-50.
- [21] 廖凡.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J].中国法学,2018(5):41-60.
- [22] 金应忠.从“和文化”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J].社会科学,2015(11):18-33.
- [23] 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J].社会科学,2014(6):13-18.
- [24]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4-18,156.
- [25] 山口定.关于“共生”[N].朝日新闻(日本),1994-10-30.
- [26] 井上达夫.走向共生的冒险[M].每日新闻出版社,1992:24.
- [27] 海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是首个恢复增长主要经济体[EB/OL].北京日报,http://bjrb.bjd.com.cn/html/2020-07/28/content_12473931.htm,登陆时间:2020-09-26.

- [28]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潜力[N]. 人民日报, 2020-08-14(003).
- [29] 苏长和.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 5-25, 156.
- [30] Lawrence S. Finkelstein.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J]. Global Governance, Vol. 1, 1995, pp.367-372.
- [31] 蔡拓.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 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6).
- [32] 冯铮. 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 重大疫情应对中的三层治理角色及其互动[J]. 东北亚论坛, 2020(5): 76-85
- [33] 胡守勇. 共享发展理念的世界历史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4): 63-70.
- [34] 蔡亮. 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 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J]. 社会科学, 2014(9): 30.
- [35] 王淑荣, 许力双. 共享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与实践指向[J]. 红旗文稿, 2016(4): 14-16.
- [36] J.N.Rosenau and E.O.Czempei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
- [37] 俞正樑, 陈玉刚. 全球共治理论初探[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2): 8-15, 4.
- [38] 刘勇, 王怀信. 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中国方案优势[J]. 社会科学文摘, 2019(6): 36-38.
- [39] 习近平. 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N]. 人民日报, 2013-03-28(002).
- [40] 高奇琦. 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N]. 人民日报, 2016-02-03(007).
- [41]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09(002).
- [42]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EB/OL]. 人民日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10/30/nw.D110000renmrb_20201030_1-01.htm, 登陆时间: 2020-12-28.
- [4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4/08/c_1122651110.htm, 登陆时间: 2020-12-29.
- [44] 季思.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实现现代化[J]. 当代世界, 2019(11): 1.
- [45] 综述: 积力之所举, 众智之所为——国际社会为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点点赞[EB/OL]. 新华社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7/01/c_1123062634.htm, 登陆时间: 2020-12-29.
- [46] 本报评论员.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N]. 人民日报, 2018-08-30(002).
- [47] 汪长明. “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共享性[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6): 67-73.

[责任编辑 许佳]

of East Asian seas pollution, which is described by the classic game model.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Jap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countrie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nd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can explain the crux of the poor effectiveness of coopera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in the East Asian sea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optimize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each governance bo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marine destiny", and provide a Chinese solu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oper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ast Asian maritime pollution in the face of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Key Words: East Asian Sea Area;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Marine Pollution; Community of Marine Fate; Action Strategy; Game; Chinese Solution

De-hegemonization: The Era Trend of Neo-seapower under the Narrative of Se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ZHU Qin GAO Lan · 74 ·

Abstract: Se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is a kind of the sea narrative initiated by China. The sea narrative is a discourse system to shape the sea order and the seapower as well as safeguar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Due to China's weak sea narrative, in the world sea narrative, Chinese seapower was almost submerged and "represented" by the West's, which further affects the maintenance of China's historical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an organic part and development in marine field of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describes a type of de-hegemony neo-seapower and new sea order, which is the watershed of seapower from monopoly to sharing and from tradition to neo-pattern. Chinese seapower narrated by Se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is a kind of the neo-seapower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eapower, that's, a power of sea governance with de-hegemonization, not the zero-sum maritime hegemony. Because of the inertia of traditional seapower and the dominance of American maritime hegemony, the neo-seapower and its concept will suffer many challenges until it forms a universal consensus. However, the neo-seapower with de-hegemonization will become the era trend of the future seapower.

Key Words: Se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a Narrative; Neo-seapower; Traditional Seapower; Sea Order; De-hegemonization

Rival Regionalism and the Status and Future of Asian Cooperation

ZHANG Chi · 85 ·

Abstract: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ise of rival regionalism has become a very noteworthy phenomenon in Asian cooperation. However, rival regionalism is not a new thing for Asia, but has been nurtur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ccompanied with the taking-office of Trump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Asian rival regionalism appeared new tendencies: First, the logic of cooperation shifts from economy to security; Seco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served as a tool for supremacy among great powers; Third, the cont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shifts from rule contests to value disputes. These changes have brought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the leading role of ASEAN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ospects of Asian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sian rival regionalism from slipping into malignant competition, Pan-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 that the two mechanisms can avoid complete confrontation and jointly provide public goods for Asian countries in certain areas.

Key Words: Rival Regionalism; Asian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do-pacific Strateg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alysis of Russia's Asia-Pacific Energy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ar East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

CHEN Xiao-qin · 100 ·

Abstract: With a huge reserve of oil and natural gas, Russia, at the st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posed the initiative to unlock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Eastern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and to accelerate energ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longside which the Asia-Pacific area was listed as the priority for Russia's geographically diverse export structure. The natural gas pipeline "Siberia Power" and the "East Siberia-Pacific" oil pipeline, drafted as two main infrastructures transiting resources to Asia-Pacific, has achieved major developments at the end of 2019.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Far East oil and gas pipeline, the Sino-Russia energy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closer, as the two sides endeavored to build a reciprocal energy securit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 diversified energy relationship, promising a share-destiny of energy reciprocity. Meanwhile, Russia has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energy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Asia-Pacific states,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sia-Pacific energy security system. Given the strengthened supply capacity, changes are to be brought to the energy supply-demand balance in regions and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tructure. Nonetheless, constraints still exist regarding uncertainties such as funding, consuming market and the geo-security environment. Towards this en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ulti-centered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increased demand of eastern areas,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effective multilater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Asia-Pacific, to build a sharing platform for Asian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o gradually reach the connections among energy infrastructures that can jointly prevent external risks and avoid undisciplined competitions, with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overall energy strength of the region.

Key Words: Russia; Asia-Pacific Energy Strategy; Far East Oil and Gas Pipeline; Regional Energy Structure; Sino-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Promoting Symbiosis Through Sharing: China's Promo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YAO Lu JING Jing · 113 ·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problem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ope with it is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crisis, the survival of human society needs to go beyond self-interest to achieve intergrowth among countri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ymb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China's plan defines the goal of symbiotic glob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from negative symbiosis to positive symbiosis, so as to realize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luggishness of self-upgrading by symbiosis and the urgency of practical needs. "Symbiosis" is not inevitable in the aspect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realization. It cannot provide a universal benchmark and standard for the solution of practical problems. It needs to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by the idea of "sharing". Specifically,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ivity, symbiotic ties and symbiotic bottom line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e idea of sharing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subject identity and the value guidance of harmony and inclusiveness. Through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the idea of sharing can be effectively led to reality, and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symbiotic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will help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the new symbiotic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Key Words: COVID-19 Pandemic; Symbiotic Global Governance; Sharing;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ational Governance